

以笔为旗



世纪末文化批判

● 愚

士选编

●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以笔为旗

——世纪末文化批判

● 愚 士选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以笔为旗

——世纪末文化批判

愚士选编

责任编辑:余开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湘潭市印刷厂印刷

*

199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4

字数:534,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 ISBN7—5404—1686—6
I·1347 定价:27.9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湘潭市城正街板石巷 13 号 邮编:411100)

前 言

九十年代的今天,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到来,商业化、世俗化的浪潮汹涌高涨,席卷而至。文学领域所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和侵袭,有目共睹。文人世俗化和文学世俗化已成当今时尚,普遍流行。传统的士志于道已转变成士志于利;文以载道已转变为文以载欲。对于上述文化现象,众说纷纭,多有歧义,由此引发的学术讨论和文艺论争,则是方兴未艾,高潮迭起,深受广大读者关注。这一方面反映出九十年代文化界、学术界多元竞争、空前活跃的生动局面;一方面也辐射出在世纪之交的动荡之中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冲突和文化选择,这是极富时代意义的。特别是当前学术讨论和文艺论争中产生的一些不同流俗、独立思考的文章,不但有益于健康学术氛围的传扬,更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确弥足珍贵。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指出,学者真正的使命是:“高度重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过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过程。”他意味深长地说:“一个丧魂落魄的时代,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狂想,它带着恐惧的心情,使自己的视线避开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鄙可耻的画面。”因此,真正的学者应该具有一种精神,一种为真理和学术献身的精神。诚如费希特所言“把我这个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从我们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路”。为了给当前广大读者提

供九十年代较为典型、丰富的文化信息,给今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具有文化价值和代表性的参考史料,我们收集选编了这本书稿,但愿对当代的文化建设有所助益,对广大读者有所启迪。由于编选者能力和条件所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恳切期望得到广大读者及方家谅解和指教。

编 者

一九九六年十月金秋

目 录

前言

旷野上的废墟

- 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
..... 王晓明 张 宏 徐 麟 张 柠 崔宜民(1)
- 批判与反省 王晓明(17)
- 就 95“人文精神”论争致日本学者 ... 陈思和(23)
- 人文精神驳难 刘大枫(37)
- 社会转型与人文精神追寻 张德祥(54)
- 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 傅 杰 王元化(77)
- 争论使人想起了顾准 钱 竞(90)
- 愧对顾准 丁 东(96)
- 读顾准 王敦洲(99)
-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王彬彬(105)
- 反抗妥协 熊元义(112)
- 城头变幻二王旗 朱学勤(117)
- 被涂改了的宽容 费振钟(123)
- 宽容与批判 王彬彬(127)

为“批判”正名	王彬彬(130)
向 21 世纪文学期望什么	王晓明 铁 舞(134)
是否需要重新评价鲁迅	公 刘(144)
重读鲁迅	王敦洲(148)
大哲与大洁	王敦洲(152)
为了不再忘却的纪念	李 锐(158)
虚无之海,精神之塔	李 锐(162)
勇敢的呆子	施战军(167)
如何面对鲁迅——这是个问题	殷国明(169)
以笔为旗	张承志(173)
无援的思想	张承志(176)
三舍之避	张承志(192)
诗人为什么不愤怒	张 炜(199)
怀疑与信赖	张 炜(202)
灵魂的声音	韩少功(225)
世界	韩少功(230)
理想的召唤	谢 冕(249)
文学需要理想精神	张慧敏(252)
文学“转向”和精神“溃败”	洪子诚(256)
重新发现理想	孟繁华(259)
时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萧夏林(272)
抵抗的姿态与理想精神	萧夏林 尹昌龙(278)

历史不再等待.....	许 明(282)
九三年.....	公 刘(285)
对当代精神忘却现象的评析.....	王岳川(290)
不能缺钙	公 刘(299)
《不能缺钙》编后追记.....	刘 粹(305)
翻案文章	邵燕祥(309)
要为汪精卫翻案吗	冯英子(312)
庄严与无耻、伟大与卑鄙.....	何满子(315)
也谈周作人	章 明(322)
由胡适所想到的	江海涛(326)
老调子还没有唱完	扎西多(330)
对“新市民文学”之质疑	章德益(340)
对“新市民文学”之再质疑	章德益(343)
俯瞰江南文学.....	章德益(346)
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梅疾愚(350)
何“热”汪国真.....	叔缓人(354)
世纪末的文化漩流	樊 星(357)
文学不能放弃个人精神的高度	
.....	王光东 周海波(382)
关于世纪末文学的对话	北 村 谢有顺(392)
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	北 村(400)
批评的道德与道德的批评	
.....	许纪霖 杨 扬 薛 毅(413)

学术讨论与政治文化情结	郑 敏(424)
批评的冒险与失态	燎 原(430)
文艺批评的蜕化与回归	刘文中(438)
一场文学批评引出的话题	韩小蕙(442)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之我见	朱 晖(448)
历史的限制与现实的选择	林为进(463)
文化行为的亢奋和虚脱	
..... 黄毓璜 丁 帆 王彬彬 费振钟(475)	
“大众文化”给我们什么?	
..... 黄毓璜 丁帆等(487)	
文学的当下处境与对策	龚曙光(499)
俗世中的时尚.....	许纪霖(505)
形而下的迷失.....	萧 元(513)
渴望堕落	
——谈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倾向	王力雄(518)
独语：在苍茫时刻	
——我们时代精神流亡的反零度描述 ...	向 荣(527)
文学的蜕变	余开伟(544)
形而上的迷茫.....	萧 元(552)
一个反历史、反哲学的命题	雷池月(559)
你到底要什么.....	谢 泳(566)
庄严下的绥靖.....	萧夏林(569)
在没有方向的风中跳舞	梅疾愚(580)

欲望的舞蹈	洪治纲 凤 群(589)
裤裆文学和文学裤裆.....	公 刘(602)
隐逸文学的悲哀	毛志成(605)
一个急需正义感的文坛	李洁非(609)
道德恐惧症	李洁非(615)
“精神圣徒”张承志抨击文坛堕落	邵燕君(619)
文人的蜕变	余开伟(624)
请照照历史这面镜子.....	雷池月(629)
文人的行状及其它	金 梅(636)
文坛综合症	安 黎(640)
“淡泊”是一张画皮	安 黎(646)
文人的骨头	王开林(651)
文艺家与“政客”	崔卫平(654)
“可怕的是混进官场的流氓”.....	公 刘(660)
流氓的“诚实”.....	王开林(663)
你是流氓,谁怕你!	简 平(668)
作家三“格”论.....	毛志成(673)
作家病了	林伟平(678)
编辑也“病”了?	曾文渊(680)
张贤亮现象	虞 兮(683)
关于直面俗世.....	兆 亿(685)

刘心武：围着“问题”打转.....	程光炜(689)
漫说你批评得对	艾 达(692)
当今学界的南王北李.....	高增德 丁 东(695)
普及吴祖光	谢 泳(697)
李泽厚令人失望	谢 泳(699)
关于张承志的话题	钟闻言(701)
九四年的一种声音	蔡 翔(708)
理解张炜	邓帅萍(710)
批评家的胆量.....	雷 达(712)
评坛一绝	阎 纲(716)
慨叹之余	洁 泯(720)
新锐之想	李书磊(722)
伪造的文学和文学的伪造	
——也谈移民文学	林 希(725)
移民文学的歧途	吴 亮(729)
请入历史的迷雾	朱 正(731)
还有什么不能卖?	江南黎果(735)
“聊备一册”聊胜于无.....	王乾荣(738)
“写给工人兄弟”	刘润为(742)
何日看遍长安花	韩石山(745)
给逝者一点安静	风 清(756)

旷野上的废墟

——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

王晓明 张 宏 徐 麟
张 柠 崔宜民

王晓明(以下简称王):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我过去认为,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明白了,这是个错觉。即使在文学最有“轰动效应”的那些时候,公众真正关注的也并非文学,而是裹在文学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可惜我们被那些“轰动”迷住了眼,直到这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才猛然发觉,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对文学失去兴趣了。

照我的理解,爱好文学、音乐或美术,是现代文明人的一项基本品质。一个人除了吃饱喝足、建家立业,总还有些审美的欲望吧?他对自己的生存状况,也总会有些理不大清楚的感受需要品味,有些无以名状的疑惑想要探究?在某些特别事情

的刺激下，他的精神潜力是不是还会突然勃发，就像老话说的神灵附体那样，眼睛变得特别明亮，思绪一下子伸到很远很远，甚至陶醉在对人生的全新感受之中，久久不愿意“清醒”过来？假如我们确实如此，那就会从心底里需要文学、需要艺术，它正是我们从直觉上把握生存境遇的基本方式，是每个个人达到精神的自由状态的基本途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文学自有它不可亵渎的神圣性。尤其在 20 世纪的中国，大多数人对哲学、史学以至音乐、美术等等的兴趣，都明显弱于对文学的兴趣，文学就更成为我们发展自己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了。

因此，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

张宏（以下简称宏）：我想从创作现象来谈谈对文学危机的看法。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危机在作家创作方面有两种表现，一是媚俗，一是自娱。其实这两种方式倒是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延续。自古以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看似把文学抬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其实所谓“大业”和“盛事”，只是帝王的业和事。到了现代，帝王的事业不复兴旺，文学的“载道”功能便转换为代人民立言。这也是一个很崇高的事业，每当人民欲言又止之时，文学事业就格外发达。可如今，文学的这一功能逐渐被其它传播媒介所取代，人民自己独立发言的能力也逐渐发达，文学“载道”的事务就又濒于歇业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功能只好转移到“缘情”上来，而这不过是自娱的一种漂亮的说法罢了。总之，文学没有自己的信仰，便不得不依附于外在的权威。一旦外在权威瓦解了，便只有靠

取悦于公众来糊口，这便是媚俗的方式。要不然就只好自娱自乐了。这就好比找不到用武之地的拳师，或者去走江湖，靠卖狗皮膏药度日；不然就得回家去，自己打拳健身。

看起来，作家王朔采取的主要是第一种方式。有人说他是个讽刺作家，我却认为，他的作品总的基调是“调侃”，而不是讽刺。这两者绝然不同，尽管从表面上看，它们是那么相似。讽刺有着喜剧的外观，而其背后有一种严肃性。讽刺总是以一种严肃的姿态批判性地对待人生，它清除人生的污秽，是生命的清洁工。讽刺所显示的批判性甚至高居于作为个体的讽刺者及讽刺对象之上，达到对普遍性的生命价值的肯定。调侃则不然。调侃恰恰是取消生存的任何严肃性，将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它的背后是一种无奈和无谓。王朔笔下正是充满了调侃，他调侃大众的虚伪，也调侃人生的价值和严肃性，最后更调侃一切。在这种调侃一切的姿态中，从调侃对象方面看，是一种无意志、无情感的非生命状态，对象只是无谓的笑料的载体。从调侃者本身看，也同样是一种非生命状态。调侃者一如看客，他置身于人生的局外，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只图一时的轻松和快意。调侃的态度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并且，还把承担本身化为笑料加以嘲弄。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和孱弱的生命表征。王朔正是以这种调侃的姿态，迎合了大众的看客心理，正如走江湖者的卖弄噱头。

王：这当中包括了迎合大众想发牢骚，想骂娘的心理，大众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宣泄怨愤的快感。

宏：王朔以这种方式博得了大众青睐。在调侃中，人们通过遗忘和取消自身生命的方式来逃避对生存重负的承担。然而，现实生存并不因这种逃避而有丝毫改变。从这里也可以看

出中国人生存境况之不堪和生命力的孱弱。不然，人们何以像抓救命稻草似的乞灵于这一点点可怜而又无聊的“轻松”呢？

从嘲弄和挖苦大众虚伪的信仰到用调笑来向大众献媚，王朔兜了个大圈子。倘若他要迎合得更彻底些，当然还得满足大众必然会有的道德上的虚荣心。王朔果然一改以往嬉皮士似的反道德面目，而以“好人一生平安”的空头许诺来劝善。嬉皮士变成了道德家，这可称得上真正的喜剧。

徐麟（以下简称徐）：其实，在文学上，“王朔现象”并不罕见，它是《儒林外史》及以后的谴责小说和四十年代包括《围城》在内的所谓“讽刺文学”的恶性重复。尽管作者们的社会角色迥然不同，但从他们对语言的态度和操作中可以找到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正统价值观念崩溃后的产物，并都是对文化废墟的嘲笑。问题不在于嘲笑和调侃本身，而在于废墟只对人来说才是废墟。嘲笑也要有嘲笑者。嘲笑者并不是作者的肉体存在，而是被我们称之为人文精神的价值指向。《儒林外史》中还有王冕式的人物，无论他离我们有多么的遥远，但这表明作者还有一种人格和信念的意指。这种意指在《围城》中更加漂浮不定。但是，方鸿渐毕竟还有惶惑、无奈和拒绝，毕竟还指向了某种可能的东西。王朔之为恶性的重复就在于他的文本没有任何结构上的意指。也许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顽主》中他尚有某些痛苦感和彷徨感，但这些感受在后来的作品中完全被消解了。痛苦的消解是因为认同了废墟，彷徨的终止则是因为不再需要选择，因而就没有也不需要任何可能的人文意向。一旦嘲笑者本人也成了废墟，那末，他就不能指向任何外部世界，于是便只有在玩弄语言的褻渎与嘲笑中获得一种自慰式的快感。

宏：对这样的快感的追求，在所谓“玩文学”派那里有着更

为突出的表现，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暴露出文学创作的危机。王朔是与民同“乐”，“玩文学”者则独“乐”之。他们把文学当作自娱自乐的工具，独自把玩，回味无穷。

徐：譬如，“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艺术创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集中而突出。近来极为叫红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主人公颂莲是张艺谋努力赋予某种现代人文意识的洋学生。她不是用轿抬，而是自己走进陈家大院的，并且还说出了“这里有狗、有猪、有耗子，就是没有人”的“人”话来。但她不仅很快洞悉了陈家大院里一切，而且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与众姨太太的争风吃醋中。这个转向似乎可以解释成人物复杂性和艺术处理上的脱节，但在全片的结构中却成了对礼教的皈依，并且嘲弄了对礼教的反叛主题。更重要的是，在电影语言上，张艺谋是对“后现代主义”模仿得比较像的。色彩上，如对红色的大肆渲染；音响上，如捶脚声的音响主题反复出现；构图的对比性，视角的变换，长镜头的运用以及对点灯笼、挂灯笼，吹灯笼的精心刻画等等，都造成了画面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性的效果。但最强烈的反差更在于影片中使用了在中国人看来最具现代性的技巧，所表现的却是中国文化最陈腐的东西。因而，颂莲的那些“人”话就仅仅成了一种主题的装饰。张艺谋的真正快感只是来自于对技巧的玩弄。

张柠（以下简称柠）：本来影片中表现什么倒并不十分重要。所表现的事物既可以是陈腐的，也可以是美好的。关键在于这些事物在作品中所产生的功能。这种功能取决于文本的语义指向，从根本上说，它又是取决于作者主观的价值取向。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看不出张艺谋对其所表现的陈腐肮脏的东西有多少批判意识，相反，他始终在大肆渲染和玩味这种东西。

徐：《大红灯笼》在国内外的反应是很值得关注的。它的技术在西方世界早为人所熟知，甚至已开始过时，但因为它表现的是被称之为“中国文化”的那些东西，而使西方人大开眼界。至于中国这边的亢奋的反应，则来自于对所谓“后现代主义”之类“新潮”艺术的迷恋，而忽略了作品价值取向上的陈腐性。能像《大红灯笼》那样引起东西方人对对方陈腐性的互相欣赏的作品是非常罕见的，如果这里有为张艺谋所追求的好莱坞精神的话，那么这正是人文精神的全面丧失。

张艺谋电影探索的文化动因，是当代文学中的“寻根”意识。例如《红高粱》吧，应该说，对于现代文明生命的萎缩以及被阶级意识或政治革命等“历史动机”所淹没了的欲望或生命冲动来说，它确实有一种反叛和反历史的意味。它把余占鳌式的暴力取代建筑在更原始的个人占有欲上，不仅颠覆了暴力革命的神圣性，也确实意指了某种历史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它不是指向新的生存可能性及其精神空间，而是指向文化回归的道路。这是为张艺谋所熟悉并且认同的。只是这种文化回归很快就在《菊豆》中透了底。杨天青不仅不能取代父辈而公然占有菊豆，而且还只能作为自己儿子的哥哥跪拜在宗法道德和政治秩序的神座面前偷情。他会犯禁，但欲望的冲动根本无法与道德秩序相抗衡，其结果只能导致自我阉割。至于在《大红灯笼》中，颂莲用自己的脚走进了旧道德规范，因而欲望满足的方式是给定的，她必须在礼教许可的范围内不懈竞争，才可能短暂地获得她的男人。所以，在象征欲望的红色中，“我奶奶”是以认同并接受暴力来满足的，菊豆是在道德秩序下靠偷情来满足的，而颂莲则干脆投身到礼教规范中来获取满足。这是否就是张艺谋的“欲望三部曲”？

宏：以上两种方式尽管有种种不同，却共有一个根本的原